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二辑

我的大学

金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二辑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 著

王宏容 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王宏容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我… II. ①高…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365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4.75 印张 119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 套

ISBN 7-80084-236-3/I·32

定价: 600.00 元 (全 38 册)

前 言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高尔基出身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市，父母早亡，寄寓在外祖父家，十余岁出外独自谋生。十九世纪末开始从事创作，作品多反映俄罗斯下层市民的痛苦和欲望。二十世纪初，他参加革命民主运动，创作了《母亲》那样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十月革命后思想一度出现波动，列宁的被刺促使他重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边，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一九二五)，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他的作品在对社会心理及底层人情的揭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我的大学》是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三部，完成于一九二二年。小说描绘了阿列克谢十六岁至二十岁在喀山的生活。他抱着上大学的希望来到喀山，但很快就意识到穷人上大学仅仅是幻想。他住在贫民窟里，为了谋生，去当码头工人，又在面包作坊里干活等等，残酷的生活现实磨炼了他的品格，使他最为深切地体会到人性被压抑直至毁灭的痛苦，并能自觉与工人群众一道为生存和解放而斗争。大学生和有革命情绪的青年组成的秘密小组成了阿列克谢的“社会大学”。总体而言，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复杂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尤其是民粹派思想对阿列克谢的深刻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却已成为积极探求生活真理的不妥协的青年。

一九九八年六月

终于，我去喀山大学学习了^①，就这么回事儿。

是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激起了我上大学的念头。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青年，长得也很英俊，一双眼睛像女人般温柔可爱。他那时跟我住在同一幢楼里，因为常见我手里拿着书，便留意起我来，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没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总想让我承认这一点：我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你天生就是块搞科学的料。”他说道，潇洒地甩甩他那马鬃般的长发。

那时我什么都还不懂，就算是只家兔，也能服务于科学。可叶夫列伊诺夫成功地使我相信：我这样的青年正是各个大学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地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②的掌故又被搬了出来。叶夫列伊诺夫又说，如果我去喀山的话，可以住在他家，用秋冬两季学完中学课程，再“随便”把几门考试应付过去（他就是这么说的：“随便”！）。到了大学里，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只要五年时间，我就能成为“学者”了。这一切在他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那时的叶夫列伊诺夫才十九岁，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一考试完就回家了。两周之后，我也跟着上了路。

年迈的外祖母与我送别时，劝告我说：

“你可别再对人乱发火了！你总爱发火，变得又凶，又傲慢！这都是从你外祖父那儿学来的，可你看看你外祖父，成了个什

① 大约在一八八四年夏末或秋季。

②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俄国著名学者、诗人。

么样子？这苦命的老头子，活了几十年，竟落得变成个傻子。你得记住：上帝不评判人的对错，魔鬼才专爱此道！再见啦，唉……”

几滴无奈的眼泪沿着她松弛的面颊淌了下来，她抹了抹，又说道：

“咱们再也见不着啦！你这不安稳的孩子，要远走高飞啦，而我呢，却时日不多……”

这几年来，我常不在亲爱的外祖母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想到此刻就要同她诀别，同这个和我血肉相连、善良体贴的老人诀别，一时也不禁悲从中来。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就站在码头边儿上，一手画着十字，一手不住地拿起那条旧披肩的角儿，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总是流露着温柔和慈爱的黑眼睛。

于是，我来到了这座半鞑鞑式的城市，住进了一处平房的一间小屋。这所平房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窄巷尽头的土坡上。房子的一堵墙正对着一片火灾后的荒地，荒地上杂草丛生；一堆砖瓦房舍的废墟，隆起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游荡的野狗就生在那里，也埋葬在那里。我决不会忘记这个大地窖，它是我上过的那些大学中的第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的妈妈，仅依赖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拉扯着两个儿子。刚开始到他家的几天，我就常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市场回来，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橱桌上，琢磨着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就算抛开自己不算，又怎样用这么一小块肉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让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吃得满意呢？

她的话很少，灰蒙蒙的双眼流露着一种无奈而温和的坚强，仿佛一匹已经声嘶力竭的母马，明知自己再也无法把车往坡上拉动，却仍然在拼命挣扎。

来到她家第四天的一大早，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的孩子们那时都还没起床。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

“您上这儿来想干什么？”

“读书，上大学。”

她双眉往上一挑，脑门上发黄的皮肤也跟着向上一紧，一不留神被菜刀割了手指头，她忙吮住伤口的血，在椅子上坐下，但又立即跳了起来，说道：

“噢！见鬼……”

她把受伤的手指用手绢包起来，称赞我说：

“您削土豆倒挺利索的！”

哼，这还不简单！我于是跟她讲起了在轮船上帮厨子干活儿的事。她又问道：

“你以为凭这么两下子，就能上大学了吗？”

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开玩笑。我把她的问话当了真，便把我的行动计划对她详细地讲述了一遍，还说，只要这样按计划行事，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为我而敞开。

她叹了口气叫道：

“噢！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进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朦胧，头发乱蓬蓬的，但还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

“妈妈！能包顿饺子吃多好呀！”

“嗯，好吧。”妈妈答应道。

为了拿自己的烹饪知识露露脸，我说道：这点儿肉对于包饺子来说，实在不合适，而且太少了。

这句话惹得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火冒三丈。她用尖酸的话讽刺了我几句，害得我连耳根都涨得通红。她把手里的几个胡萝卜朝橱柜上一甩，扭头便出了厨房。尼古拉朝我使使眼色，对此解释道：

“生气啦！……”

他在凳子上坐下来，又接着跟我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情绪化。她们的天性使然。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好像是个瑞士人，曾经无懈可击地论证过这个问题，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这一点上也说过类似话。

尼古拉很喜欢教导我，因而不放过任何一个合适的机会，向我灌输一些生活的基本常识。对这些话，我也听得非常认真。后来，我竟然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三人混为一谈。我也搞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杜模力的头呢，还是正好相反。这个招人喜欢的青年，诚心诚意地要“把我教育成人”，他也满怀信心保证这一点。但是他抽不出时间，而且也不具备好好教我的条件。在那种青年人的轻率和自我为中心习气的影响下，他看不到母亲在怎样为维持家庭的生活而精疲力竭、费尽心血地操劳。他弟弟是个孤僻迟钝的中学生，对此就更无法感受了。而我却早已看透了这个女人那套精妙的厨房里的经济和化学玄理。我清楚地看到她如何应对自如：每天都得想办法哄住自己孩子的肚子，又要养活我这个相貌平庸，举止粗鲁的异乡人。当然，每当拿到分给我的面包时，它们都像重重地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开始想去随便找些什么活儿来干。为了不待在家里吃闲饭，我每天一大早就出门，遇上天气不好时，就躲进荒地上的那个大地窖，坐在里面倾听飘摇风雨，闻着那些死猫死狗的恶臭。我终于明白：上大学——那无非是个梦罢了。如果当初去了波斯，也许比来这儿要明智些。这样想着我就幻想自己成为了一个白胡子的法师，能让谷子长到苹果那么大，能让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而言之，我为这块土地——这块还有无数像我一样穷困潦倒之人的土地——设想出了许多有益于民的善举。

我已经学会了对奇遇冒险和丰功伟绩的幻想。在生活陷入困境时，这些幻想极大地帮助了我。而因为艰难的日子太多，我也变得越来越会幻想。我并不奢求别人的援助，也不等待时运

的降临，在磨难中，我的意志变得顽强起来，生活的条件越是艰苦，我就觉得自己愈发坚强，甚至愈发聪明。我很早就理解到：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熟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要想上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戈比的工钱还是不难的。在那儿，与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块被投进通红炉火的生铁。每一天都被烙下许多新鲜、炽热的印迹。那些欲望裸露、禀性粗野的人，旋风般地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愤恨现实生活，嘲笑、敌视世间一切，对自己无牵无挂的态度。我过去所经历的生活，使我对他们怀有一种亲近感，产生出想要加入他们那个充满着刺激和力量的圈子的愿望。我读过勃来特·哈特的作品和不少“低级趣味”的小说，因而更激起了我对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人们的同情。

有一个职业小偷，名叫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如今潦倒不堪，还染上了肺病。他循循善诱地开导我：

“你怎么跟个姑娘似的，总那么畏首畏尾？是怕人说你不安分守己吗？安分守己对姑娘来说，是她一生的财富。可那对你而言只是个枷锁。公牛倒能安分守己，那是因为它整天只吃干草！”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色头发，脸上像演员一样，刮得光光的，身材矮小，动作敏捷轻巧，仿佛一只猫。他把自己看做是我的老师和保护人，我看得出，他真诚地希望我能有所成就并赢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许多好书，最推崇的是《基督山恩仇记》^①。

“这本书中有理想，又有真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总是津津乐道，神采奕奕，那虚弱的身体也一阵阵痉挛起来；这种病态的痉挛让我很感嫌恶，但

^① 《基督山恩仇记》：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觉得他的话美妙动听。

“女人，女人！”他抑扬顿挫地说道，黄色的面孔泛起一片潮红，赞赏的目光在两只乌黑的眼中闪烁，“为了女人，没有什么我不肯干的事。女人仿佛就是魔鬼，毫无罪孽可言！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跟女人恋爱更甜蜜了！”

他很有讲故事的天分，能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爱情的感伤动人的小曲。他的这些小曲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各个城市被广为传唱。这首流传甚广的小曲就出自他的手：

我本贫寒，亦无美貌，
锦衣罗裳更难找。
仅仅为此，姑娘呀！
人世孤舟，无依无靠。

有一个叫特鲁索夫的行踪隐秘的人，也待我很好。他相貌堂堂，衣着讲究，手指像音乐家那样纤细。他经营着一间小店铺，处于城郊的船舶修造厂地区。铺面外边儿挂着“钟表匠”的招牌，但实际上是个销赃的场所。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跟偷窃这种事儿沾上边儿！”他对我说，同时半眯起那双狡黠而又目空一切的眼睛，得意地捋着花白的胡须，“在我看来，你不是这条路上的人，你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

“重精神生活——那是什么？”

“那就是说，对什么东西只抱有好奇，而不是羡慕。……”

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我羡慕过许多人，也羡慕过许多事，比如拿巴什金来说，我就对他那种独特的诗歌般的语调、奇妙的比喻以及出色的表达能力钦羡不已。我记得他是这样开始讲述一个爱情故事的：

“黑漆漆的夜晚，我独坐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的一家客店

里，仿佛一只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时是十月，秋风萧瑟，更兼丝丝细雨，那声音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绵声低唱着一曲哀歌，没有尽头：噢—噢—噢—呜—呜—呜……

“……正在这时她来啦，那么轻盈，那么明艳，宛如朝阳乍现时的云彩，但眼中流露出的纯洁无瑕却是伪装的。‘亲爱的，’她带着诚挚的语调说，‘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不是事实，但却相信了她的谎言。凭理智，我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在情感上，我却无法承认她在欺骗我！”

他嘴里讲着，身体还随着有节律地晃动，眼睛微闭，不时用手轻轻按住胸口。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嘶哑，但每句话都透人肺腑，有点夜莺歌唱的韵味。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讲的那些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都那么生动有趣，而一谈起高级僧侣的生活，他又是那么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有一次他还神秘地提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真是个能干的君主！”

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他们在故事结尾时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无私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该属于这类“坏人”。

遇上闷热的夜晚，人们就会渡过喀山河，坐在对岸矮树林里的草地上，一面吃喝，一面谈起各自的事情。无非是谈谈生活的复杂、人际关系的纠缠之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女人。他们一谈起女人，便显得愤懑、哀伤，有时又很感人，而且总是怀着一种窥视黑暗的心态——那黑暗充满了神秘可怕的事情。在星光寂寥的黑夜，在长满河柳的湿热洼地，我和他们一同度过了两三个晚上。这里临近伏尔加河，由于晚间空气湿润的缘故，那些船桅上的灯火就像一只只金色蜘蛛，在黑暗中向周围爬动，一簇簇火团和交织的光带闪现在漆黑的岩石河岸上，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酒馆和民宅的窗户放射出的光芒。河水被

轮船的轮片打得“噗噗”作响。驳船船队间传出水手们狼嚎似的吆喝声。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在用锤子敲打着铁板，拖长了声音凄楚地唱起歌谣，抚慰自己忧伤的心灵，歌声把一抹淡淡的哀愁笼上人们的心头。

而更令人神伤的是静静地聆听这些人的轻言细语，他们思考生活，述说自己的心事，几乎并不留意别人说些什么。他们躺在、或者坐在树丛里，吸着烟，随口喝点儿伏特加或啤酒，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我遇上过这么件事儿。”黑暗中，有人趴在地上说道。

等到故事一讲完，大家便纷纷表示：

“常有这种事啊，常能见到……”

“见过”，“经常如此”，“遇上不少啦”，——听着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们已经走到了生活的终点，什么都已经经历过了，再无新鲜可言。

这种感觉拉开了我和巴什金、特鲁索夫的距离，但我仍然喜欢他们。如果沿着我经历的轨迹，我跟他们走上同一条道路那是很自然的。往上爬和念大学的梦想遭受打击时，我就更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在忍饥挨饿、蒙受屈辱和烦恼郁闷的时候，我就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以及犯下其他罪行，可我却总被青年的浪漫主义从偏离的道路上拉了回来。那时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的书和一些低级趣味的书之外，我也读过不少正正经经的书——正是它们催促着我去不断追求，虽然并不知究竟要追求什么，但那一定是比我所见过的一切都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我交上了几个新朋友，有了些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常常引来一些中学生玩击木游戏^①。

^① 击木游戏：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划地为城，用木棒把对方竖在城内的木棍击出城外，击出多者为胜。

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让我产生了好感。他有浅黑的皮肤，头发有些发青，像日本人，脸上长着雀斑，仿佛上面掺和进了火药末。他总是很快活，游戏玩得很灵活，谈吐也幽默风趣，似乎真有种天才的萌芽蕴藏在他体内。但他也像所有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守着这点天赋过日子，再没想过去拓展、提高。他的听觉很敏锐，又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他自己也喜好音乐，能像艺人那样出色地演奏古丝理琴^①、三弦琴以及手风琴，但却对进而掌握更高级、更繁杂的乐器不感兴趣。他很穷，衣着褴褛。但那件皱巴巴的破衬衫，那带着无数补丁的裤子和破了洞的皮靴，却与他豪迈的气质、英挺身材的矫捷动作和粗犷的作风很是相称。

他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或者刚刚刑满释放的囚徒。在他眼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带给他无限的快感。他仿佛一支被点着的烟花，在地上蹦来蹦去。

他听说我生活困难，处境艰险，便提议让我搬到他那儿去住，还劝我准备准备，争取当上个乡村小学教师。于是，我就搬进了这个古怪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概许多代喀山大学生都对此地非常熟悉。这是一所破败不堪的大房子，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街，它仿佛是被那些饥肠辘辘的大学生、妓女以及被社会抛弃的无用者的幽灵，直接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古里的住所就在连接走廊与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摆着他的单人床，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摆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了。走廊连着三个房间，有两间住着妓女，第三间里住着一个染有肺病的教会学院的大学生，研究数学的，又高又瘦，样子长得很可怕，头上和脸上生满了红褐色的硬毛，一身衣服肮脏而破旧，勉强能遮盖住身体，从衣服的窟窿里，暴露出他泛青的皮肤和嶙峋的肋骨，让人毛骨悚然。

① 古丝理琴：古代俄罗斯的弦乐器，类似我国的古筝。

他似乎只依靠吃自己的手指甲生存，把指头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绘图呀、计算呀的，还不停地发出咳咳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但是又同情他，常常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之类的在他门口，他就像匹劳累的马一样呼呼地喘着粗气，把这一包包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拿回屋去。如果妓女忘了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没有送给他礼物，他便打开房门，冲着走廊沙哑地叫喊：

“面包！”

在他那深陷于黑眼窝的眼睛中，闪动着一种狂人般的自命不凡和高傲。一个驼背的小个子，有时会来看看他。这人跛了一条腿，肥大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阉割派^①教徒的蜡黄脸上，挂着狡黠的微笑。他们把自己紧关在房里，沉默不语，安安静静地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只有一次，时至深夜，这位数学家沙哑的咆哮声把我给惊醒了：

“照我看——这简直是监牢！几何学——是笼子，哼！是抓老鼠的笼子，哼！监牢！”

瘸腿的驼背尖着嗓子发出嘿嘿的笑声，并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些不明所以的词句，数学家突然怒吼起来：

“混账！滚！”

这位客人被赶了出来，气愤不已，在裹上宽大的破披风时，还不停地尖声叫骂。这时又高又瘦的数学家站在门口，面目狰狞，把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沙哑地喊叫道：

“欧几里得^②是个白痴！白一痴……我确信，这个希腊人不如上帝聪明！”

他呼的一下关上房门，震得屋里什么东西哗啦啦地掉了下

^① 阉割派：又叫“修心派”，产生于俄国十八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教徒必须实行阉割手术以绝欲。

^② 欧几里得（公元前315—前255）：古希腊几何学家。

来。

后来没多久，我听说这个人是想用数学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完成这一事业之前他便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校对工作，上的是夜班，每夜能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抽不出空去挣钱，我俩每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什么时间出去干活，因为我得学习。我正拼命死啃各门学科，尤其在为那些死板的语法格式感到烦恼，我完全没法在这些僵硬的格式中填入新鲜的、灵活而质朴的现代俄罗斯语言。不过没多久，我就高兴地发现：现在学这些为时“过早”。即便我能考取乡村教师的资格，但受年龄的限制，我也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古里和我同睡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通宵达旦的工作使他精疲力尽，面色发青，双眼红肿。他清早一回来，我便马上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很自然，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就坐在窗前，吃面包、喝茶。古里会给我讲讲报上的新闻消息，读读化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我对古里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感到很奇怪，他对生活的态度，简直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物兼做拉皮条生意的胖女人加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楼梯下的屋角就是他从这个胖女人手里租来的，可他无力支付“房租”，于是就靠给她说说笑话、拉拉手风琴、唱唱动听的歌来作补偿。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时，双眼便闪现出嘲弄的光芒。加尔金娜年轻时曾在歌剧合唱班呆过，很能领悟歌曲的意义。常常有许多感动的泪水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中流出，淌过她这个酒鬼和馋鬼浮肿、铁青的面颊。她便会伸出肥胖的手指抹去泪水，然后又拿出一条令人倒胃的手绢仔细擦那指头。

“哟！古里呀，”她赞叹地说，“您真是个演员！如果您再漂亮点儿——我包您会走运！我安排过许多年轻小伙儿，去陪伴那些闲极无聊的女人呢！”

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就住在我们楼上。他是个大学生，一个毛皮匠的儿子。这小伙子身材中等，胸膛很宽，大腿却异常细瘦，整个身体看起来像个锐角朝下的大三角形，而且这个锐角还折断了一点，——这位大学生的脚跟女人的一样小。他的脑袋也很小，深深地陷进了肩胛，上面胡乱竖着些马鬃般的红头发，一双碧绿的眼睛从惨白、缺乏血色的脸上凸起，显得灰蒙蒙的，没什么神采。

他背弃了父亲的意愿，像条游荡的野狗一样无以为生，费尽心机，才终于念完了中学，升入大学。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嗓子低沉而柔和，是副很好的男低音，于是他便一心想着学习唱歌。

加尔金娜就利用这一点，把他塞给了一个富商太太。这位太太年过四十，一个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很瘦，胸脯扁平，直挺挺的像个士兵，脸上的表情总是无动于衷，冷漠得跟禁欲的修女一般。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两个黑黑的眼窝里。身穿黑色的连衣裙，围着旧式的丝绸头巾，一双镶着绿宝石的耳环总在耳朵下面晃来晃去。

她常在晚上或者清晨来找她的大学生。我看见过好几次，商人太太像是跳进大门似的，步伐坚定地走向院子。她的脸色很吓人，嘴唇紧紧地闭成了一条线，眼睛瞪得老圆，带着绝望的神情望着前方，那样子看起来像个睁眼睛。虽说她并不是个丑陋的女人，但你能明显地感到她体内有一股紧张的力量，仿佛是这股力量拉长了她的身子，扭曲了她的面孔，使她变得丑陋不堪。

“瞧！”古里说，“真是疯婆娘！”

大学生对这位商人太太非常厌恶，总想避开她。商人太太却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债主或者暗探一般，死死抓着他不放。

“我是个不能抛头露面的人，”大学生喝了酒后，后悔地说，“唉！我为什么要去唱歌？就凭这长相和这身材，人家就不可能

让我登台表演，决不可能！”

“你别再跟那婆娘纠缠不清啦！”古里劝他说。

“你说得对。只是我可怜她！我真没法忍受，但是又要可怜她。你要是知道她是怎么……唉！……”

我们其实早就知道，因为有天晚上，我们听见那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哀求：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宝贝，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位商人太太控制着一家大工厂，拥有大量房产和车马，还曾向产科学校捐赠过数千卢布，而如今却像一个乞丐一样乞求男人的抚爱。

喝完早茶，古里便躺下睡觉，而我则到外边去干点杂活儿，晚上才能回来，那时古里又该去工作了。如果我能带回点面包、香肠或者煮牛杂什么的，我们就平分，他带走他的那一份儿。

我一个人闲下来时，就在“马鲁索夫卡”的走廊上转悠，看看我这些新邻居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幢房子真是拥挤不堪，宛如一个蚂蚁窝。到处弥漫着刺鼻的酸臭味儿，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充满敌意的浓厚的阴影。这里从早到晚都嘈杂不休：缝纫机的响声从不间断；歌剧班的歌女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用男低音哼着音阶；一个半癫狂的，发着酒疯的男演员，手舞足蹈地高声朗诵对白；喝醉的妓女们有事没事地狂叫个不停。面对这一切，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个无法回答的疑问：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个秃脑门周围长着红头发的人，颧骨很高，肚子又大又圆，却长着两条细腿，肥厚的嘴唇包着一口马牙般的牙齿。因为这口牙齿，他得到了一个“红毛大马”的绰号。他常和那些食不果腹的年轻人混在一起。他跟他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商人打官司已经打了三年，并逢人便说：

“我豁出性命不要，也得把他们彻底搞垮！让他们沦落街头，过上三年乞丐生活，然后，我就把判给我的财产统统还给他们，